

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充分肯定的成绩。但是，我们有多少真正能够揭示我国人文世界的本来面目的研究成果呢？此外，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复杂原因，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至今为止还很少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过中国境外各民族和文化的。如果这有情可原，就境内社区、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来说，我们又有多少成果达到人文世界的“和而不同”的那一使命呢？之所以有这么些问题，原因必定是很多、很复杂的，也不是我们一时能轻易理清的。

几年前，我曾经回顾中国社会学 20 年来的发展历程，提出了“补课”的说法，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们的社会学是在匆忙之中“速成”的，这给我们的学科带来了基础没有打好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我们需要从头开始，从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始，来为学科的研究能力恢复“元气”。倘若能容我在这里对人类学学科建设说点什么，那么，我愿意重复我对社会学同仁们说的那席话。在 21 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这成了我们必须细致思考的问题。而这当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假如我们的学科要对 21 世纪的进程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它就需要有一个坚固的学科基础。在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学科里，这样的基础显然还需要我们去打造，而我们同时却又需要为建造“和而不同”的世界做贡献。学科发展时间与历史发展时间的“脱轨”，必然会使我们觉得措手不及。但是，这也许就是新的世纪对我们和我们的学科的新挑战。

## 民族生存与发展

——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演

费孝通

我很高兴来参加第六届社会学人类高级研讨班并负责第一讲。我自开始教书以来，讲课时不喜欢跟着稿子讲，今天仍是这个老办法，先把讲稿发给大家，请大家认真读并给予批评，而我今天则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即兴发言。

先讲一讲我是如何准备今天这个题目和讲稿的。

去年是西北民族学院建校 50 周年，我来到这里，当时很兴奋，建议把预定今年举办的第六届研讨班办到西北地区，配合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第一届研讨班是在 1995 年办的，至今不到 10 年已办了第六届，这是由于同行们热心支持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时势发展的需要。我看到手册中已把前五届的主题内容做了归纳，第三届、第四届的论文集也相继在最近出版了，走一步是一步，这是我们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过程，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国际和国内时势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21 世纪全球的居民已经开始了更紧密的接触和交流，走上了一条被称为“全球化”的道路；二是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发展迟缓，已从领先地位退居到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是在 20 世纪后期的 50 年中发生了巨变，在进入 21 世纪时刻，正处在急迫并努力赶上发展前沿的关头，已看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苗头，在 21 世纪里有希望重见光明，为地球上的人类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为我们中华文化的定位。

人的思想是由时势所造成的，也反映了所处时势的地位。因此我们发生了“文化自觉”的要求，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某种文化之中的人们的自知之明，目的就是在争取文化发展的自决权和自主权。我们这些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此类高级研讨班就是这种客观形势所决定而自觉组织起



来的。我是一个一向主张“从实求知”和以知识来创新推进实际的人，所以凭这种看法，不顾年老，还要不远千里来参加这个研讨班。具体地说，加强人类学的研究，是文化自觉的要求，这种要求来于客观历史的发展，这个历史的要求推进了我们，我们到这里参加这个班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必须看到，这也是客观形势造成的。

知识份子的思想发展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我在每一届研讨班上的讲话，也反映了我这个人的思想变化。谈到人类学进入了 21 世纪时，各人的感觉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觉就不一样，小的时候，盼着吃年夜饭，觉得时间过得那么慢，而现在似乎眼睛一眨，半年就过去了，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这一方面是我这个年纪的人的感觉，另一方面中国近期的变化也确是惊人的，是全世界人们所意想不到的。现在我们希望 21 世纪中国能够有更大的变化、更快的发展，就是实现我所说的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三级两跳”。我早年的江村经济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都属于农村乡土社会的研究，后来提出要发展乡镇企业、工业下乡，用工业化来改变乡土社会，一直搞了 50 年。

进入 80 年代，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我接受了重建社会学（也应当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学科建设任务，至今又有 20 年了，而那时我去美国访问，已经看到他们用计算机处理数据资料了，机器要比北大当时的计算机小得多，整整差了一代。那时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这几年我们也热闹起来了，大家写文章不用笔了，连我写文章的办法也变化了。就是在这个第二跳里，每个人也在跳，我的思想也在变化。现在可以用录音的办法整理我的讲话，整理成稿后再让我修改，而且可以多次修改，效率提高了。有时候还是通过大家讨论后整理出来的，文章也集体化了一些，吸纳了大家的思想，已不是属于一个人的思想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这几年我常常在心里发愁的是，一位鄂伦春族的女同志在 1998 年第三次高级研讨班上向我率直地提出的一个问题：“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她的意思是，她看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正受到重大的冲击而且日渐消亡，先要把人保住，才提得到文化的重建。她提出的问题很深刻也很及时，因为在这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些根蒂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免不了要发生这个听来很触目惊心的问题。我一直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同时又记起我在大学里念书时读到的一本英国人类学者（Peter Rivers）写的书，书名叫《Clash of Cultures》（《文化的冲撞》）。他写的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怎样被消灭的故事，他说在一个文化被冲撞而消灭时，土著人也就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意志。就在我在英国留学期间（1936 年至 1938 年），曾在报上读到澳大利亚南端 Tasmania 岛的土人最后死亡的消息，对我震动很大，因之一直在心头烦恼着我。

1979 年我赴加拿大讲学时，曾参观访问了该地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看起来他们住的不错，有房子，有电视，还有汽车，虽然导游告诉这是二手货，是摆样子的，但是看来这个民族在政府的财政补贴下保存了下来，而且生活还可以。但是管理印第安事务的人告诉我，这些印第安人酗酒、打架，非正常死亡率很高，生活没有目的，主要是安生立命之道没有了。这已是 20 年前之事，我并没有机会仔细调查。我在 1987 年考察呼伦贝尔盟和大兴安岭时，看到了鄂伦春族的问题。我们的政府的确也尽力在扶持这个民族。他们吃住都没有问题，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但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生机的社区，不是自力更生的状态。当读到美国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时，不能不激起我的思考。文化和民族是会消灭的，这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不能平静地接受这个历史事实，我总是认为那些提倡个人自由的西方文化，怎能容忍民族和文化消亡的事实发生在这个时代？西方文化中某些因素主张种族消灭论，现在很多地方还在打仗，南斯拉夫、中东地区战火不断，甚至动用飞机、导弹，互相残杀。我们主张民族平等、共同富裕，但由于自然条件和环境的改变，造成了一些民族在生产能力和职业方面的不适应，给了他们土地也不会种，怎么办？所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在我国万人以下的小小民族有十多个，他们今后如何生存



下去？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下去？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怎么办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虽然并不那么急迫，而小小民族在现实生活里已有了保生存和保文化相矛盾的问题了。

因此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心里想，我们中国当前所走的路子和所执行的政策，正是和西方的某些路子唱反调的，我们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首先要保证民族生存，反对消灭民族。

我有幸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得到继续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机会，我在这 20 年里“行行重行行”，尽可能地到各地去访问，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接触。我到过黑龙江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族和甘肃青海交界边上的裕固族、撒拉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我见到他们的处境和困惑。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小民族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不采取办法来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了，问题是如何改变，所以我前年又到黑龙江去访问赫哲族，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人数特小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鄂伦春族面临的情况是森林发生了变化，而赫哲族本来靠渔业生活，现在他们传统的渔业越来越不景气。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努力改善环境，保护渔业生产，尽可能的帮助他们的生活，如利用鱼骨做艺术品、装饰品等；另一方面设法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文化，给他们地种，但是他们把地转租给汉人去种或是找打工的汉人来种，这说明一种文化向其他文化的过渡并不那么简单。要生活下去和解决贫困需要有一个复兴的计划，而这种计划必须在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这应该是社会学、人类学者的任务。

所以我从东北回来就向国家民委具体提出“小小民族”的研究建议，取得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现在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牵头，与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组织了队伍，开展了 22 个 10 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第一期工作已结束，正在进行第二期的工作。我心里想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能坐视小兄弟面临困境而无动于衷，我们有力量帮助他们生存与发展，同时要允许他们在文化走向的问题上有自主权和自决权。我们中国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还可以做跨国的比较研究，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民族政策做一个比较，中国提倡民族平等、共存共荣的政策与西方民族政策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互相帮助，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榜样来，这正是社会学、人类学者要做的事，走出一条新路，其意义不仅是在国内，而且对今后的世界有重大意义。

在座的有来自各个民族的学员，希望大家来共同思考和关注这样的重大课题，民族的文化要如何发展？往什么目标发展？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触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多元文化并存的年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我已经九十多岁了，想做的事很多，但已力不从心。新一代长成，老一代交班，希望新一代更快更好地成长，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我们的高级研讨班也要继续办下去。人类共处的问题要好好解决，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生命的代价。保文化就是保命，保住人也才会有文化，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它是保命的工具。所以一切要以人为本，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 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座谈会上的发言

费孝通

刚才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很好，我把它们归纳起来，总的讲一讲。

